



劳模是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人物。他们既是普通劳动者，又是开风气之先、引时代潮流的社会精英。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的劳模情结还得从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时期说起。

1957年，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厂时，同炼钢工人亲切谈话

毛泽东的劳模情结

陈建新

□ 亲手给劳模发奖状和奖品

1933年5月中旬，在已经进入多雨季节的江西瑞金，一场1.4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正在武阳区武阳村紧锣密鼓地举行，这是我党领导召开的第一次关于农业工作的大会。而在三四百千米以外的南昌，蒋介石正在刚刚成立的南昌行营里，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大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万人。

相对于中央苏区危机四伏的外部环境和局势，更糟糕的是，指挥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毛泽东已被排斥于党和红军的军事领导核心之外。但此时的毛泽东更关心的是苏区的农业生产问题，因为随着国民党军的包围和封锁，苏区11万红军的给养和工农群众的基本生活只能依靠自己。

1933年春，苏维埃政府为推进苏区的农业生产，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决定在苏区开展春耕生产竞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武阳区克服各种困难，一马当先，取得了突出的业绩，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据瑞金当年参加表彰大会的部分老同志回忆，由于武阳区在春耕中取得了很好的经验，苏维埃政府为了总结和推广经验，决定在武阳区召开春耕生产运动代表大会，表彰先进模范单位，通过树立典型来推动春耕运动。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这次大会，会议总共开了5天。会上，毛泽东向大会作了春耕生产的动员报告，并将由毛泽东结合武阳区生产经验起草的《春耕生产运动大纲》发给了到会代表，供代表们讨论。会议还专门安排了一天的群众大会，号召会人员学习武阳区的好经验。在会上，毛泽东代表苏维埃政府将写有“春耕模范”的锦旗赠给了武阳区和石水乡群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大张旗鼓地表彰劳动先进。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劳模工作作了专门的论述，他说，提高劳动热忱，发展生产竞赛，奖励生产战线上的成绩卓著者，是提高生产的重要方法。

此后，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持续，战争消耗逐渐加大，苏区的青壮年男子，成分好的几乎都去当了红军，后方的生产任务就落在了妇女肩上。为了表彰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苏维埃政府于1934年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妇女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多地妇女代表参加，部分代表中的犁、耙田能手还到瑞金武阳区进行了现场劳动示范表演。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现场会。老一辈革命家、曾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的李坚真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叙了毛泽东重视劳动竞赛、关心劳模的感人细节：毛主席那天穿了一身便衣，脖子上搭了一条毛巾，裤腿卷得高高的，站在田埂上。他要看看妇女学犁田、耙田到底行不行。当他看到那些妇女犁、耙田能手，扶着犁把在水田里操作得很好，学习犁田的妇女劲头也很高，高兴极了，对大家说：“封建社会有种迷信说法，说妇女犁田会遭雷公打，现在时代不同了，男女平等，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你们女同志今天不是也做到了吗？”毛主席讲完话，又亲手给学犁田、耙田的妇女劳模发了奖状和奖品。奖品是一条围裙和一顶竹笠，围裙上绣了“学犁耙能手”的字样，竹笠上印有“劳动模范妇女”几个大字。

从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经历了一年多的苦战。由于王明、李德等人“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在大部分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后方军民全力以赴的生产支援，苏区红军压根就无法支撑一年之久。更关键的是，由于毛泽东的积极倡导、评选、表彰劳模和先进作为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工作方法，被很好地传承下来。从中央苏区时期起，劳模情结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

□ 特等劳动英雄的画像

摆在主席台上

“七七事变”后，时局并没有给刚到陕北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人太多喘息休息的时间，而国共两党的政见分歧也注定了双方的合作只能停留在表层。这一点，对蒋介石来说，联合抗日是迫不得已，而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认识更加清醒：抗日和生存，只能靠自己。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开展表彰劳动英雄运动，以调动群众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劳动热情。1938年1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举办了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展览会的宗旨是，“通过这一竞赛运动，在国防生产战线上，将有千万个劳动英雄产生出来”。为了办好展览会，毛泽东亲自带头捐款捐助物资。展览会结束后，组委会给获奖单位和个人发了奖，毛泽东在奖状上题词：“国防经济建设的先锋。”边区的劳模运动由此开始。

1939年，党中央及边区仍然承受着经济上的巨大困难，毛泽东为此发出了大生产的号召，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机关、部队、学校人员生产运动奖励条例》等，规定对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个人和单位给予奖励。

困难时期，毛泽东还托人给杨步浩捎去几斤白糖、两瓶酒和两块布料。这一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接见了这位老英雄。之后，又把他请到中南海家里，设宴款待，同他长时间交谈，了解延安的变化，感谢延安人民的问候。

□ 与劳模频繁互动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的艰巨任务，具有凝聚人心、调动人民群众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的劳模表彰活动，愈发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各领域、各行业不断地开展不同层次的劳模评选，活动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其感召力和影响力也更加强烈。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1950年9月25日至10月2日，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对劳模给予了明确定位：“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这种定位给劳模和以劳模为榜样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与鞭策，是造就那个时代劳模辈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次大会共有464人荣获了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其中很多人在根据地、解放区就已经是成绩卓著、声名远播的先进典型。会议期间，代表们受到极高的礼遇。他们参加了国庆大阅兵；出席了毛泽东主席及其他机关主办的招待宴会、座谈会，并与毛主席合影留念；参观了工厂、农场，游览了故宫、颐和园等。大会明确规定，劳模表彰作为一种固定制度要长期坚持下去。

1956年4月30日至5月10日，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再度在北京召开。马永顺、王金禄、王崇伦、张秉贵、赵梦桃、时传祥、王进喜等劳动英雄，以及华罗庚、钱学森等教授、科学家受到表彰。此时，劳模工作的中心环节就是总结与传播先进经验和技能，把他们创造的先进工作法、先进工具、先进技术，以及先进经验迅速传播给全体劳动者。

据上海退休工人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上海女劳模到处做报告、教技术。女劳模到哪儿都是先做思想政治教育的报告，教育大家要勤俭节约、学习技术、为国家做贡献之类的；然后才是教技术，先教几个比较聪明的骨干，骨干再慢慢教大家。”那时，一些先进生产者的模范事迹和革命精神曾经做到了家喻户晓和妇孺皆知，使整整一代人受到教育和鼓舞。劳模们对先进经验和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有力地推动了“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

在毛泽东那里，劳模总是受到礼遇。在国庆大典的庄严时刻，他邀请劳模一同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他多次宴请劳模，把他们奉为座上宾。据公开资料，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的劳模，如“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全国著名先进班组长——马恒昌小组和职工民主管理的创始人马恒昌、安徽籍农村杰出妇女代表龙冬花、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申纪兰等人都曾13次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1966年国庆节前，毛泽东特意把掏粪工人时传祥接进中南海小住，国庆节当天，时传祥作为贵宾被请上了天安门。全国植棉能手来贺9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曾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并列，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誉为“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而这也让钱学森认为是平生中最激动的三个时刻之一。80岁的钱学森读《史来贺传》，激动地说：“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并且与劳动人民中的优秀分子连在一起了，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出乎人们的意料，毛泽东要在生日这一天请客。这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而生日宴会的主题是招待劳模和科学家。客人是科学家钱学森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大庆“铁人”王进喜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等，都是正在参加第三届全国人代会的代表。见到劳模，毛泽东高兴地说道：“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有工人，有农民，我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散席前毛泽东还给在座的几位一人一个苹果，并一一握手告别。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从毛泽东对待劳模的态度中，可以真切感受到人民群众在他心中的位置，也理解了人民群众为什么把毛泽东看成自己的亲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怀着十分朴素而真挚的情感，许多劳模和先进代表见到毛泽东无不被一代伟人超凡的领袖风范和令人震撼的个人魅力所感染。毛泽东的一个握手，一句问候，一句鼓励的话，哪怕一个场景在劳模那里都会变成强大的精神动力。

全国劳模陈双田，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但回到家乡后还是整天挑粪下农田，他说：“当劳动模范就要带头劳动，不劳动，还算啥劳动模范。”商业战线上的全国劳动模范张士珍，7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她说：“毛主席接见我时，特别嘱咐我们劳模说要好好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结束语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裔妇娟、杨富珍、时传祥、王进喜、倪志福，到60年代的焦裕禄、邓炎棠、马凤英，这些劳模都诞生于国家十分困难的环境下，当时，全国自上而下需要有模范形象来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忘我劳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这些深受毛泽东思想鼓舞，并在毛泽东的关心下成长起来的一批批劳模，在全社会树立起了榜样，他们不愧为人民的楷模、社会的中坚、国家的脊梁、民族的精英。

进入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把劳模看作是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因为他们本身既是群众中的一分子，了解实际情况，能够把人民群众的呼声带上来；同时他们在群众中又有极高的威信，思想觉悟高于普通群众，能够把党的路线和政策传达下去。在毛泽东的关心下，一批批全国劳模先后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在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来自农业领域的全国劳模陈永贵、来自纺织行业的全国劳模吴桂贤和铸工出身的天津劳模孙健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来自沈阳工业领域的劳模李素文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可以说，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它的最终落脚点是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不断阐释、反复强调的群众路线的核心，也是劳模表彰活动诞生至今始终不变的终极诉求。

“群英会”“感动中国”“新中国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每个时代劳模身上所汇聚的人格品质，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完美体现，也是对公民文明素养最为真切的诠释。也正因为一代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努力倡导，才使劳模这一称号深入人心，才使劳模这一群体在社会上享有无上荣光，才使学习劳模成为全社会永不过时的风尚……

历史随笔

争的境界

清风慕竹

唐顺宗永贞年间，柳宗元因参与革新运动失败而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赴任时还没走完一半路程，又被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他的朋友刘禹锡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被贬到朗州（今湖南常德）任司马。二人同病相怜，时常写信互相鼓励。

元和十年（815），按照旧例，柳宗元被移作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而刘禹锡则要远赴播州（今贵州遵义）任刺史。任命的诏书下达，柳宗元对身边的亲近人说：“刘禹锡有老母，年龄已大，如今他到蛮夷远郡去做刺史，在西南绝域的地方，来回有上万里的路程，哪能让他和老母一起去。如果母亲不去，母子各在一方，这便成为永别。我和禹锡是好朋友，我哪能忍心看他们母子这样呢？”于是他起草奏章，说明理由，请求和刘禹锡对调，把柳州授给刘禹锡，自己却到播州上任。

柳宗元的这番举动感动了朝中许多大臣，宰相裴度也站出来说话，皇帝最终改派刘禹锡到条件更好一点的连州（今广东连州）赴任。这件事《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有收录，成为文坛一段佳话。

无独有偶，同样的事也曾发生在狄仁杰身上。

狄仁杰曾任并州（今山西太原）法曹参军，有一年，上级要派与他同一知府的参军郑崇质出使边远之地。狄仁杰知道郑崇质有一个老母亲，体弱多病，需要人照顾。狄仁杰自己就是个孝子，他在赴任途中，曾经登上太行山，回头远望河阳（今河南洛阳），见白云孤飞，不禁潸然泪下，对左右说：“吾亲所居，在此云下。”我的父母亲就住在它的下面啊。狄仁杰伫立眺望了很久，直到白云飘走才离开。

狄仁杰想，郑崇质此时也一定非常难过，就对他说道：“你家老母有病，而你却要远行，怎么能让人家时刻忧思万里之外的儿子呢！”于是，他找到长史蔺仁基，请求代替郑崇质去出使。蔺仁基听了，感叹不已。当时，他正和司马李孝廉闲谈，现在见到狄仁杰的所为，主动找到李孝廉说：“我们两个听说这事难道不羞愧吗？”两人由此和好如初。此后一提及这件事，蔺仁基都会说：“狄公贤德，北斗以南，仅此一人而已。”

世上的与人相争，多以自身的利益为重，而柳宗元和狄仁杰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推己及人，把别人当成自己，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这样的争，浸润着一颗仁爱之心，让他们的争成为心之柔软，争出了处世的水准，争出了做人的境界，这或许才是他们至今还为我们津津乐道的真正原因吧。

语词精奥

“文身”本来是避蛟龙之害

许晖

蔡元培先生在《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一文中说：“例如未开化的民族，最初都有文身的习惯，有人说，文身是一种图腾的标记，有人说，文身是纯为装饰。然即前说可信，亦必兼合装饰的动机。文身或在身体各部涂上颜色，或先用针刺，然后用色。”

蔡元培先生所说的文身的两种功能，“图腾的标记”和“纯为装饰”，也许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未开化的民族”的行为，但是却不符合古代中国文身的目的。

《礼记·王制》中论四夷居处言语衣服饮食不同之事：“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椎髻文身，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狄，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火食，吃熟食；椎髻，以丹青雕刻其额；交趾，两足相向内交；粒食，以谷物为食。由此可见，东夷和南蛮都有文身的习俗。

唐代学者孔颖达注解：“按《汉书·地理志》文，越俗断发文身，以辟蛟龙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以东方南方皆近于海，故俱文身。”“涅”的意思是以黑色涂物，染黑。《左传·哀公七年》载，周大王有三个儿子：大伯、仲雍、季历。周大王最喜欢幼子季历，于是大伯和仲雍就主动避位，从渭水之滨来到东南沿海一带，因为经常要下海，所以“断发文身，裸以为饰”，避蛟龙之害。

《汉书·地理志》则认为夏代第六任国君少康的庶子“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东汉学者应劭注解：“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龙子乃龙之子，由此记载可知龙子的习惯装扮就是“断发文身”，人们模仿龙子，蛟龙就不会在水中伤害他们了。

这就是古代中国人最初“文身”的原因，既不是“图腾的标记”，也不是“纯为装饰”，而是为了适应东南沿海生活的需要，以避蛟龙之害才发展出来的习俗。